

论“文明冲突论”的狭隘性

曹升生

(渤海大学 历史系,辽宁 锦州 121013)

[摘要] “文明冲突论”通过对西方文明的独特性的强调,对西方力量的限度的考察,从反面凸显了西方文明的普世性,从而也在根本上显示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非西方世界的疑惧和敌视。就国内根源而言,它也显示了美国白人对日趋活跃的少数种族的深闭固拒。

[关键词] 文明冲突论; 东方主义; 白人至上论; 狭隘性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8)05-0008-03

在冷战后涌现的诸多国际关系理论中,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争议最为激烈的一个理论,赞之者以为燃犀烛微,体大思精,可与凯南首倡的“遏制”政策比肩;^[1]贬之者认为管窥蠡测,牵强附会,难以概括当今世界政治的实际。^[2]但这些评论只涉及到一些表象,倘若放宽视界,从世界历史和美国历史的双重角度去考察,我们就会发现,“文明冲突论”本质上既与东方主义若合符节,又与美国白人至上论一脉相承。实际上,在这双重的镜像中,我们看见了“文明冲突论”的狭隘性。

西方人主导了近现代的世界历史,而这种主导地位的确立,按照一般的说法,开始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自此以降,西方人凭借船坚炮利的物质优势和民主平等的组织优势,对非西方世界发起了前所未有的殖民活动,到十九世纪末,世界已经被欧美列强瓜分完毕。现实中的优势地位催生了理论上的优越感,于是一种讴歌西方文明丰功伟绩而贬斥非西方文明的“东方主义”如影随形地发展起来。^[3]在这种思维的视野里,西方世界和东方世界判然两分,西方优越,代表着文明和先进;非西方落后,象征着愚昧和黑暗。西方和非西方处在不同的等级上,并且西方世界负有向非西方世界传播文明的使命。要而言之,这种思维将非西方世界设定为一个迥异于西方的他者,其存在的目的,在现实中是为西方世界提供了原材料和市场,在精神上就是证明了西方的优越。

但这种优越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因为西欧国家在相互厮杀中耗尽了实力和尊严,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就将其时西欧普遍的失落和沮丧表露无遗。令西方人庆幸的是,西欧主导国际格局的时代虽然结束了,但作为西欧旁支的美国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

间的犹豫之后,勇敢地承担起维护西方文明尊严和地位的责任。杜鲁门主义的出台,马歇尔计划的出笼,无一不是美国因应已失势的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的呼吁,而毅然决然做出的战略决策。^[4]美国人自信满满地以西方文明的主将自居,领导西方世界对抗以苏联为核心的共产主义世界。虽然冷战进程几起几伏,但美国最终不战而胜。

冷战的胜利,一度让美国人欣喜若狂,反映在国际关系理论上,其典型就是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倡言美国式的民主是人类最好最后的治理模式,非西方世界只有取法于美国才能臻于民主富强。与这种极端乐观主义相反,塞缪尔·亨廷顿另辟蹊径,推出了“文明冲突论”。他首先颠覆了西方文明具有普世性这一说法,认为这种说法隐藏了晚近崛起为世界主导力量的西方人的倨傲,如今的问题是非西方世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先是借鉴了西方化的成功经验,而后就日益回归自己的传统,并进而挑战西方世界。要面对这个挑战,西方世界只有强调和增强自己的独特性才能一如既往地保持优势地位。“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不在于发展方式的不同,而在于它的价值观和体制的独特性。这些特性包括最为显著的基督教、多元主义、个人主义和法制,它们使得西方能够创造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并成为其他社会羡慕的目标。……这些特性使得西方文明成为独一无二的文明。西方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独特的。因此,西方领导人的主要责任,不是试图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这是西方政治衰落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独一无二的特性,^[5]在这里他特别强调了美国力量的限度:“西方与非西方关系的中心问题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西方文化的努力与其推广能力的下降这两者之间的不协调”,^[6]由此出发,美国决不可以汲汲惶惶地去追求所谓的

[收稿日期] 2008-06-16

[作者简介] 曹升生(1975-),男,安徽怀宁人,渤海大学历史系讲师。

全球霸权,而是应该淡泊明志,深根固本。在这种欲盖弥彰、以退为进的烟雾中,我们得以窥见亨氏宁静以致远背后所隐藏的的老成谋国。因此也就无怪乎许多美国人对文明冲突论心有灵犀,大加褒奖。

但在另一个角度看,亨氏实际上通过自己对西方文明独特性的强调,又重构了西方文明的普适性这个根深蒂固的命题。因为在他眼里,只有西方文明具有现代性。换言之,他以更加精巧、更加隐蔽的方式复活了西方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东方主义情结。但东方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割裂东西方世界事实上相互依存的主观臆断。具体来说,晚近西欧的崛起,仅仅从西欧内部去找原因是不够的。贡德·弗兰克早就论证说,早在西方建立现代世界体系以前,就已经存在一个以亚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促使开辟新航路的,虽然有欧洲内部发展所孕育的某种推力,但更重要的还是亚洲发达的经济提供了更强大、更关键的拉力。^[7]但在“文明冲突论”的视野里,西方与非西方完全隔离和割裂开来了,二者畛域分明,而且非西方世界窥伺着西方的财富和荣誉。西方世界因此要防患于未然,弥祸于无形,深沟高垒,自守藩篱。一句话,西方世界要生于忧患,而不能死于安乐。

二

“对外政策永远不能脱离其国内背景的发源地”^[8],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声息相通。就“文明冲突论”而言,亨廷顿之所以对国际政治忧心忡忡,本质上还是来源于他对美国种族关系变动的忧虑。这种忧郁在《文明冲突论》中初露端倪,但其完整而清晰的表述则是《我们是谁?》。实际上,这两本书堪为姊妹篇,全面地显现了亨廷顿独特而狭隘的世界大局观和美国民族观。

美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多种族社会,各种族自觉不自觉地通过各具特色的方式对美国历史做出了大小不等的贡献。最初由欧洲宗教改革热潮中逃逸而来的白人新教徒凭借组织上和器物上的优势,得以迅速和彻底地将原居民印第安人征服而取而代之,并在奴役和榨取黑人劳动的基础上获得了巨大财富:美国白人的优越感在继承了老欧洲的东方主义的基础上由此又得到了强化和延伸。这种优越感在美国建设大陆帝国和海洋帝国的过程中有增无减。但自建国伊始,以黑人为代表的少数族裔就一直为美国白人在宪法中所宣扬的自由平等而不屈不挠地奋斗,其中就有血风腥雨的内战,但它最富有成果的运动还是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因为在那场运动之后,美国国会通过了《民权法案》,赋予了少数族裔充分享有美国民主和自由的权力。而美国总统约翰逊发动了鼓励和支持少数族裔进入国家主流生活的肯定性行动,其中以教育中的双语教学和就业中的配额限制最为明显。在肯定性行动计划指导原则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下,美国种族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面对这个剧变,许多白人惴惴不安,如何重新看待白人的社会地位,如何重新界定美国的民族属性,就成了一个迫切而现实的问题。“由于美国人口结构发生变化,族裔间的差异又有持久的活力,因此欧洲文化在美国一枝独秀的局面已经归之为一种历史现象了。……如今的问题不是美国人应否从多元文化的角度

理解自己的过去,而是应该以什么方式做到这一点”。^[9]

而就亨廷顿所提供的“文明冲突论”来看,则显示了白人心中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和强烈的惟我独尊意识。同时,它也从深层次上说明了《民权法案》的妥协性和欺骗性。“在那场暴风骤雨的暴力冲突(指民权运动)中,白人精英与黑人精英达成妥协,由此部分黑人精英独享了黑人群体的领导权,而白人就此获得了表面上的稳定和繁荣”。^[10]而多元文化主义在实践多年之后也证明了它在改变美国少数族裔卑贱地位方面的作用极其有限。^[11]事实上证明了白人还是愿意独享美国式的自由,而将少数族裔摒弃在外。“人们会把某些政策当作实际妥协的措施而接受下来,但是如果同样的政策被看作是对一项新原则的承诺,因而具有潜在的深远含义,就会遭到拒绝”。^[12]见诸于实际的行动,就是民权运动之后美国郊区化进程的飞速发展。白人大规模地离开城市而逃逸到郊区,在那里过着独门独院的闲适生活,而将已经呈显颓势的城市留给了少数族裔。但原本就贫穷无依的少数族裔蜗居在城市之后,境况日益恶劣,一来后工业经济时代的资源已经转移到了郊区,而少数族裔无力通勤到郊区上下班;二来,富裕白人的离去,让城市税收资源枯竭,因而市政建设和服务日趋恶化。少数族裔的年轻一代就在这种环境中发展出了一种与主流社会价值体系并行不悖但迥然有别的评判标准,自暴自弃,破罐破摔。在这种白人郊区和少数族裔城市两相隔绝的世界中,美国种族关系自然已到了足以威胁美国民族性和凝聚力的程度。^[13]

与亨廷顿的白人中心主义相反,学者迈克尔·林德提供了一种自由民族主义方案,他认为美国自建国以来就一直处在种族关系不断变动的过程中,且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789年至1861年是盎格鲁—美利坚人,即英国新教徒后裔主导的时期,此际来源于欧洲其他地区的移民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在影响上都微乎其微,而黑人和印第安人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1861—1957年是欧洲—美利坚人时期,即纷至沓来的欧洲移民改变了和扩充了美利坚民族的成分,最终在相互融合中形成了欧裔移民左右美国的格局。1972年至现在,是多元文化主义美利坚时期,即在民权运动的促进之下,美国政府以立法的形式承认了以黑人为代表的少数族裔享有与白人相同的政治权利。但由于他们族裔文化的源远流长,他们仍在相当程度上与主流美国白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实际上宣告了美国民族性形成了多元化格局。并且白人实际上依然歧视黑人,他们逃逸到郊区自成体系,而对城市中积贫积弱的少数族裔置若罔闻。要想解决这个一盘散沙式的现代美国危机,再造新的美国民族性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美国人就应该知晓美国的历史本身即是在诸种族诸族裔相互碰撞和融合的过程中不断前进的,更应该发挥历史传统中的团结互助因素,摒弃各行其是的分裂倾向,从而塑造一个泛美利坚民族。^[14]客观地说,林德的理论继往开来,在强调美国历史上诸种族的斗争的同时,更突出了他们相互融合的趋势,并从这个倾向中引申出了应对目前美国民族认同危机的积极方案。它显示了美国民族性中不断融合新鲜血液的动态过程,凸显了团结和统一性的主题,昭示了部分学者

在解决美国民族认同危机方面的不懈努力和前瞻意识。相比之下,亨廷顿虽然也回顾了美利坚民族的演变历程,但他固执地认为,美国民族特性在殖民地时期新教徒于北美大陆拓殖时,就一锤定音了。此后蜂拥而至的外来移民和不断上升的少数族裔只是在此光环之下承恩受惠而已。显而易见,亨氏的理论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夸大了美国诸种族间的纷争,视野狭隘,心态消极,从深层次显示了白人惟我独尊的偏狭心理。

三

面对汹涌而至、无孔不入的全球化浪潮,“美国人已经分化为欣赏全球化的人与抵制全球化的人”。^[15]就全球化对美国的负面影响而言,比如主权的弱化,种族关系的深刻变动,移民政治的强劲活力,有的人依然坚信美国文化具有坚实的根基和雄厚的实力,美利坚民族具有强劲的凝聚力,不但会克服这些挑战,而且还会一如既往地成为全球的引擎和楷模。而在另一些人看来,美国会被全球化浪潮淹没,从而迷失了自己。后一种观点在亨廷顿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他看来,美国应对全球化大抵有三种选择:“在现在这一新阶段,美国与世界各地保持什么样的关系,这方面可以有三种总的方案。美国人可以拥抱世界,也就是向别国人民和文化开放自己的国家;或者,美国人可以试图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去改造别国的人民和文化;或者,美国人可以保持自己社会和文化的特性,使之不同于别国人民的社会和文化”^[16]而考察美国的历史,美国应该毫不迟疑地选择第三种,即民族主义方案:“民族性质方案就是承认美国不同于别国社会,而保持自己的特性。美国若成为世界就不可能仍然是美国”。^[17]

其实这三种方案大致又可以归为两种类型的全球观,一种是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另一种就是坚持文化特殊性和排外性的文明冲突论式的全球观。第一种全球观把全球化等同于“美国化”,力图创建一种由“新自由主义”理念支配的美国式的“世界新秩序”,它决心要把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人权和自由市场理念推广到非西方世界。第二种全球观实质是亨廷顿式的宣扬一种文化等级制、特殊性和冲突性的全球观。第一种宣扬的是“优越的”美国文化的普世性,第二种宣扬的是“优越的”美国文化的独特性,但普世性只是独特性的另一种表述;上述两种全球观最终殊途同归,就是都宣扬一种“美国优越”、“美国特殊”和“美国例外”的“美国中心主义”。

这两种不同全球观的差异,在美国对华政策构想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克林顿在中国问题上之所以将人权问题与最惠国贸易待遇脱钩,正是因为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克林顿政府坚信,一旦中国允许美国的互联网公司和计算机软件公司进入中国,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就会大范围地传播开来,进而促使中国国民就中国政治体制开展大规模的讨论和反思,最终将削弱中国共产主义体制。^[18]而在“文明冲突论”的视野里,中国在儒家夷夏观的影响下,早已习惯了由内及外、层次分明的国际等级秩序,从而与近代以来由欧洲所开创的均势模式格格不入。在此前提之下,亨廷顿自然而然地得出

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19]即亨氏的“中国威胁论”。非但如此,他还一劳永逸地对中国文明的特性做出了判断:“强调权威、秩序、等级制和集体高于个人的中国儒教传统,对民主化形成了障碍”,^[20]从而在反面又论证了他关于西方文明独特性的论断。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已经看到,亨廷顿是如何承继和娴熟地运用一种旧式的东方主义的西优东劣的说辞和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范式来对国际政治进行预测。与其说他的研究和说辞是与客观的材料和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现实相适应,毋宁说更多地展示了对旧式教条与偏见的一种强烈的偏好与自觉的继承。在本质上又是对美国国内种族变化的一种消极反映和偏激心态。当代美国史大家埃力克·方纳先生在评价“文明冲突论”时就曾一针见血地评述到:“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描绘了一幅冷战后的世界的图景。在这幅图景中,那些植根于种族和文化认同基础上的文明将相互角逐以争夺霸权。……他否定了西方文化与世界其他各地区的‘相关性’。这是对传统的普世性自由观明确的背离,后一种思想起源于美国革命时期,并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被极为有力地强化了”。^[21]这也从美国人自己的角度证明了“文明冲突论”的狭隘性。

【参考文献】

- [1] [5][6][19][20][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419.360.199.255.265.
- [2] Joseph S. Nye, Jr. Conflicts After the Cold War,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J]. Vol. 19, No. 1, 1995. 5-24.
- [3] [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9.145-255.
- [4] Wilson D. Miscamble, C. S. C. George F. Kenan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47-1950[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353-354.
- [7] [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89-186.
- [8] [英]克里斯托弗·希尔:变动中的对外政策政治[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39.
- [9] [美]乔伊斯·阿普尔比等.历史的真相[Z].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274.
- [10] Douglas S. Massey & Nancy A. Denton. American Apartheid: Segrega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Underclass [Z],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56.
- [11] 王希.多元文化主义的起源、实践与局限性[J].美国研究,2000,(2):73-80.
- [12] [加]威尔·金里卡.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与公民[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9.

(下转第32页)

- 发展,2004,(5).
- [2] 邱东,蒋萍,杨仲山.国民经济核算[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8.
- [3] 郭凤芝,杨庆媛.GDP指标解析[J].统计与决策,2004,(6).
- [4] 李变花.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的设置[J].统计与决策,2004,(1).
- [5] 王玉梅.如何建立我国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J].经济管理,2006,(13).
- [6] 颜日初,马崇明.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现代化标准[J].统计与决策,2003,(4).
- [7] 李俊霖.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与评价[J].生产力研究,2007,(15).
- [8] 于秀林,任雪松.多元统计分析[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8.
- [9] “中国改革与发展报告”专家组.中国经济的“软着陆”[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7.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GDP Quality Based on Factor Analysis

GU BAI - cheng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GDP is the most important index which reflects a country's economic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level, but it has some shortcomings that single GDP is used to reflect entire economy's development situa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GDP quality according to some principles. The analysis results of Factor Analysis show that the GDP quality level of our country from 1983 to 2006 generally presents a transition from decrease to increase.

Key words: GDP Quality; Index System; Factor Analysis

(上接第 10 页)

- [13] John J. Harrigan & Ronald K. Vogel.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Metropolises [Z]. Reading: Addison—Wesley Education Publishers Inc. 2000. 442.
- [14] Michael Lind. The Next American Nation: The New Nationalism and the Fourth American Revolution [M]. New York: Free Press Paperbacks, 1995. 1 - 16.
- [15] [18] Walt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2002 [M]. New York: Mc - Graw Hill, 2002. 407. 379.
- [16] [17] [美]塞缪尔·亨廷顿. 我们是谁? 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5. 302. 304.
- [21] Eric Foner. The Story of American Freedom [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8. 331.

On the Parochialism of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CAO Sheng - sheng

(Bohai University, Jinzhou Liaoning, 121013)

Abstract: By putting emphases on the peculiarity of the west civilization and studying the limit of the west power, the theory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points to the populairiy of the west, and what's more, it shows the west's apprehensions about the non-west. In the domestic politics, it shows the White's deep arrogance when they face the burgeoning minor ethnics.

Key words: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the Orientism; the White's Superior; the parochialism